

# 形象塑造與政權鞏固

## ——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的性病防治工作

• 譚 剛

**摘要：**建國初期，在中共中央協助下，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在牧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到1966年長期危害牧民身體健康的性病被基本消滅，這也成為了毛澤東時代的公共衛生奇蹟。建國初期自治區政府在牧區大規模開展性病防治工作的主要原因，除了力圖消滅性病的嚴重危害外，也有意識地藉此塑造中共形象。這表現在官方報紙廣泛宣傳中共領導下性病防治工作的巨大成效，以彰顯中共政權的優越性。同時，中央和自治區政府還通過下撥性病防治專項經費、組織性病醫療隊、在牧區組建驅梅站等方式，以實際行動呈現輿論宣傳中的中共形象。性病防治工作的成功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切實解除了廣大牧民的切身痛苦，促進了牧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成功塑造了中共在廣大牧民中的正面形象，從而也進一步鞏固了新生的政權。

**關鍵詞：**內蒙古牧區 性病防治 形象塑造 中共政權 「人畜兩旺」政策

性病尤其是梅毒在內蒙古牧區橫行肆虐已久<sup>①</sup>。性病的肆虐，不僅對牧區廣大牧民身體健康構成了極大的危害，而且也極大阻礙了牧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消滅性病，實現牧區「人畜兩旺」的目標，從1950年開始，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開展了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到1966年，長期危害牧民身體健康的性病被基本消滅。對這一重要問題，目前學術界已有相關論著涉及<sup>②</sup>。不過，總的來講，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實際上，在建國初期，除了力圖消滅性病的嚴重危害外，自治區政府在牧區大規模開展性病防治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有意識地藉此塑造中共形象，從而進一步鞏固新生的政權。因此，性病防治工作不僅僅屬於單純的醫學和公共衛生範疇，而是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本文選擇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深入

的研究，主要是想探究自治區政府如何通過開展這一工作塑造中共的正面形象，以及這對建國初期的政權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

## 一 性病肆虐與「人畜兩旺」政策的提出

內蒙古牧區性病肆虐由來已久；到建國初期，性病流行仍然猖獗，尤以牧區最為嚴重。從表1可以看出，根據1950至1953年的調查，牧區性病患病率佔檢查人數的比例高達47.82%。性病不僅在牧區最為流行，而且症狀嚴重，主要是梅毒和淋病。據1950至1951年對呼納盟新巴爾虎左旗、新巴爾虎右旗、陳巴爾虎旗和鄂溫克旗等牧業四旗的7,627名患者統計，梅毒各期各類均可見到，即先天梅毒953人，初期和二、三期梅毒分別為3,535人、3,310人、2094人，而淋病患者有606人<sup>③</sup>。

表1 1950年代內蒙古不同地區性傳播疾病患病率的初次普查

調查時間(年)	地區	檢查人數	患病人數	患病率(%)
1950-1953	牧區*	163,801	78,337	47.82 <sup>#</sup>
1956	半農半牧區	59,947	5,200	8.67
1956	農區	11,318	546	4.82
1956	城市	6,139	437	7.12

資料來源：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局編：《內蒙古自治區志·衛生志》(呼和浩特：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頁153。

\* 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主要位於呼納盟(現呼倫貝爾盟)、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昭烏達盟(原屬熱河省)、哲里木盟(原屬遼寧省)、巴彥淖爾盟(1956年4月3日增設，主要包括阿拉善旗、額濟納旗等)、烏蘭察布盟(原屬綏遠省)和伊克昭盟(原屬綏遠省)。

<sup>#</sup> 原文誤算為47.97%

至於內蒙古牧區性病流行的原因，簡單地講，主要是衛生條件落後以及當地的性關係風俗所致。內蒙古牧區多位於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現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正如國民政府內政部官員賀揚靈在1933年調查蒙綏地區蒙古族的經濟狀況以後所言：「蒙古社會大部分還滯留在遊牧狀態中，一般人民都享受不到近代的物質生活和設備」，加之近代內蒙古地區蒙古族牧民篤信喇嘛教，他們將疾病「一切歸之於因果報應，只依佛法驅病，富者還可以招請喇嘛，診察服藥；貧者連喇嘛都請不起，只得坐以待斃」<sup>④</sup>。此外，當地的性關係風俗也為性病肆虐大開方便之門。雖然喇嘛教要求禁欲，但部分喇嘛尤其是青壯年喇嘛衝破了宗教戒律，從而加速了性病的流行<sup>⑤</sup>。在額濟納旗，「花柳病成為蒙地之普遍病態，男女俱患，尤以一般為禁欲之喇嘛為最盛」<sup>⑥</sup>。在伊克昭盟，「花柳病傳染甚廣，所以蒙人得花柳病者，多屬於青年人和一般召廟之少壯喇嘛」<sup>⑦</sup>。據1950年代昭烏達盟(現赤峰市)的性病防治調查，性病發病率最高的職業人群為喇嘛，高達41.89%，牧民為26.64%<sup>⑧</sup>。

性病流行對內蒙古廣大牧民帶來了巨大的危害。首先，性病嚴重影響了牧區的人口繁衍。以梅毒為例，患梅毒的孕婦在妊娠期內可通過胎盤而使胎兒感

染梅毒。感染一般發生在妊娠四個月以後，可導致流產、早產、死胎<sup>⑥</sup>。性病肆虐除了對內蒙古鄂爾多斯、呼納盟蒙古族人口產生影響外<sup>⑦</sup>，對其他牧區的影響同樣嚴重。如錫林郭勒盟，1790年該盟蒙古族人口為107,250人，1938年下降到67,478人，減少39,772人<sup>⑧</sup>。有學者認為近代以來蒙古族人口是絕對減少，性病等疾病的肆虐是主要原因<sup>⑨</sup>。

其次，由於被感染性病，牧區兒童的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對牧區的未來發展也構成極大威脅。有的牧區十五歲以下的兒童中有25至28%的人患有先天性梅毒。在兩個地區300多名晚發先天梅毒兒的各種症狀統計中，間質性角膜炎佔30%左右，馬鞍鼻佔9.8至24.4%，胡頰森氏齒佔19.1至25%；其他為鼻中隔穿孔，軟、硬齶疾患，主動脈炎等<sup>⑩</sup>。

再次，性病肆虐嚴重危害了青壯年牧民的身體健康，從而也嚴重阻礙了牧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據1950至1953年對牧區1,100例性病患者的調查，因患梅毒而失去勞動力的有63人，佔5.7%；患病後只有半勞動能力的有319人，佔29%。兩項合計，佔患病者總數的34.7%<sup>⑪</sup>。因此，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性病流行已不只是單純的醫學和公共衛生問題，而且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對於內蒙古牧區性病肆虐的嚴重問題，南京國民政府早在1930年召開蒙古會議時已有所注意，並採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如頒布發展蒙古族地區衛生事業的議案、在牧區建立巡迴醫療隊等。但由於政局動蕩、醫療人員嚴重不足、經費投入有限、政策沒有落實到位等原因，國民政府在當地的醫療防治工作成效極為有限<sup>⑫</sup>。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以後，政府開始重視性病防治工作。早在4月24日，時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的烏蘭夫在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未來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發展衛生事業，其中「醫藥衛生設施須大力改善，以減少疾病和死亡」<sup>⑬</sup>。1948年7月30日，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於哈爾濱召開的內蒙古幹部會議上提出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嚴格實行防疫制度」，「政府應有計劃地派人去牧區、鄉村給人民治病」<sup>⑭</sup>。在1950年1月24日的錫察兩盟工作會議上，烏蘭夫則具體提出了在牧區要推行「人畜兩旺」政策，他說：「今天在『人畜兩旺』的口號下來保護發展畜牧業，把這樣一個落後的地區變成人口增加，經濟繁榮的地區，是一個很長期的艱巨任務。怎樣增加人口，怎樣發展畜牧業就是我們的具體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具體內容。」<sup>⑮</sup>在這一政策中，推行性病防治工作則是實施「人旺」政策的具體體現。1952年12月6日，內蒙古自治區衛生部部長李本周強調推行性病防治工作是實現牧區「人旺」的前提，他說<sup>⑯</sup>：

梅毒問題是嚴重危害民族人民的健康問題甚至生存的重要問題。曾經有人估計五十年後，內蒙古民族不用武力鎮壓，只是因為性病，就可全部被消滅。由此就可看到梅毒問題對於內蒙古民族的嚴重性。事實上，在少數民族集聚的地區，特別是牧業區，在衛生方面的工作，也只有首先解決了梅毒問題，才能談到解決其他的問題。……只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根本解決少數民族的「人旺」問題。



1950年，烏蘭夫提出在牧區推行「人畜兩旺」政策。

總之，鑒於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性病肆虐的嚴峻形勢，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提出了「人畜兩旺」政策，着力制止牧區人口減少的趨勢，以發展牧區社會經濟。

## 二 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推行與中共形象的塑造

為消滅性病，從1950年開始，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在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開展了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1951年4月25日，《內蒙古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我們各級黨、政、群眾團體、醫務人員應將梅毒治療工作作為光榮的政治任務來完成，有機地配合起來，以便通過驅梅工作將草地的各項建設事業推進一步，千萬不能把它看成是醫務人員的技術性問題」<sup>⑩</sup>。由於中共領導人的重視，1952年4月6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出〈關於防治性病的指示〉，決定在六年內基本消除性病。政府要求各盟建立性病防治所，在普治地區建立由旗長、婦聯主任、衛生院長領導的，由民政、公安、文教、群眾團體以及人民代表等參加的各級「防梅」委員會，普遍開展免費「驅梅」工作<sup>⑪</sup>。隨着性病防治工作的開展，中央和自治區政府也有意識地在廣大牧民中塑造黨的正面形象，為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第一，自治區政府借助官方報紙《內蒙古日報》、「那達慕」大會等多種媒介，通過新舊對比、展覽、文藝演出等宣傳方法，在揭露「舊社會反動派」罪惡的同時，宣傳中共領導下性病防治工作的巨大成就，以彰顯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關懷，為塑造中共形象打下輿論基礎。

隨着建國初期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開展，內蒙古自治區機關報《內蒙古日報》進行了大量報導，報導內容包括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開展情況、性病防治經驗、性病防治成效等。自治區政府通過官方報紙的大量報導，形成了中共形象傳播的輿論氛圍，進而塑造了中共的正面形象。尤其是在性病防治工作的宣傳

中，《內蒙古日報》在報導牧區性病肆虐的原因時，為擴大宣傳效果，往往採取新舊對比的宣傳策略，注重揭露「舊社會反動派」的罪惡，以凸顯中共的正面形象。1952年12月6日，《內蒙古日報》發表社論稱：「內蒙古人民過去由於在很長的時期內，遭受國內外反動派和內部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在各方面都處於極端衰退和落後的狀態。尤其是梅毒的蔓延，更直接威脅到整個民族的生存。……反動統治者們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從其『消滅蒙古民族』的罪惡陰謀出發，對於這種現象一直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助其滋長。」<sup>②</sup>另一篇評論也指出：「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伊克昭盟自治區蒙古人民受着封建王公和大漢族主義的殘酷壓迫，……歷史上統治階級給蒙古人民遺留下的梅毒，更嚴重的〔地〕摧殘着蒙古人民。」<sup>③</sup>

在宣傳「反動派罪惡」的同時，官方報紙也着力宣傳牧區性病防治工作在中共領導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內蒙古日報》在宣傳上主要採用了三個策略：一、開闢專欄：1951年3月13日，《內蒙古日報》開闢了「內蒙古衛生」專欄，加強了對驅梅工作的報導，其中1951年秋季報導中心之一就是加強對梅毒治療效果的報導<sup>④</sup>。二、專題報導：烏蘭察布盟作為性病肆虐的重災區，兩年來的性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對此《內蒙古日報》進行了報導：「中央人民政府深深關懷着少數民族的健康，特派北大抗梅隊和綏遠省衛生隊，先後四次到王子旗和達爾罕旗重點進行驅梅工作，免費治療六千多梅毒患者。」<sup>⑤</sup>在呼倫貝爾盟，通過一年來的性病防治工作，人口減少的現象得以抑制，《內蒙古日報》報導稱：「只有在草地解放以後，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下，烏蘭夫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性病者才得了救。」<sup>⑥</sup>三、現身說法：《內蒙古日報》通過刊登群眾來信，宣傳性病防治的效果，例如1952年5月9日，該報刊登了性病者治癒後的感謝信，信中寫道：「我的生命是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醫生給的。如果在舊社會裏得到這種病，我是沒有活路的。」<sup>⑦</sup>

除了利用官方報紙進行廣泛的性病防治宣傳外，自治區政府還重視利用「那達慕」大會進行宣傳。「那達慕」大會作為蒙古民族特有的群眾集會，由於「集中大量群眾，利用這一高度集中的便利條件，進行宣傳工作，就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sup>⑧</sup>。在1951年的呼納盟「那達慕」大會上，內蒙古衛生廳派遣的人員進行了梅毒防治展覽，通過利用各種圖表、數字、模型書畫等，工作人員「首先讓老鄉們正確的〔地〕認識到今天草地人民其所以受梅毒、淋病及其他疾病的災害，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們所造成的」，同時「把過去治療梅毒的成績，也作為宣傳的有力根據」<sup>⑨</sup>。此外，為提高宣傳效果，衛生宣傳人員還利用文藝演出等牧民喜聞樂見的方法進行性病防治宣傳。事後有人在總結性病防治工作經驗時也認為，「宣傳工作最好採取文娛方式和通過民族形式」，甚至「演一個極簡單的歌舞、幻燈節目」，牧民也百看不厭，從而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sup>⑩</sup>。

第二，中央和自治區政府通過下撥性病防治專項經費、組織性病醫療隊、在牧區組建驅梅站等方式，以實際行動呈現輿論宣傳中的中共形象。

在建國初期牧區性病防治工作推進過程中，自治區政府除了通過廣泛的輿論宣傳塑造中共形象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共的領導下通過實際行動展現中共的

形象。通過開展實際的性病防治工作，表明了中共消滅牧區性病的決心，展現了中共的執政能力，從而為中共正面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堅實基礎。

在中央層面，為解決性病防治資金缺乏的問題，自1950年起，中共中央每年都向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下撥性病防治專項經費。截至1954年2月，中央下撥的性病防治費總共達約111.6億元，少數民族免費醫療等專款10.75億元<sup>⑥</sup>。同時，由於內蒙古地區醫療隊伍力量有限，中央還組織了大批醫療隊伍深入牧區醫治性病。1950至1953年間，中央向伊克昭盟派遣的醫療隊伍有北京大學抗梅隊、察蒙援綏工作隊、老區醫療工作隊等<sup>⑦</sup>。其中，北京大學抗梅隊在1950年兩次深入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牧區調查並治療性病。第一次是由北京大學醫學院3名性病科教員和60名高年級學生組成，第二次以高年級學生為主和少數教員、技術員(血清化驗)近200名醫務人員組成，進行了普治工作<sup>⑧</sup>。1951年7月29日至8月20日間，中央衛生部組織了內蒙古防疫工作隊在呼納盟新巴爾虎旗進行檢查醫療工作，該隊共有隊員115名。防疫隊到新巴爾虎右旗以後，以巴嘎為單位編成治療組，組內分設男女老少四小組輪流進行治療<sup>⑨</sup>。此外，衛生部還派遣著名的阿拉伯裔美籍公共衛生專家馬海德(George Hatem)帶隊深入牧區治療性病。1952年春，馬海德帶領的驅梅隊到巴彥淖爾盟牧區開展性病醫治工作，到烏拉特前旗檢查2,200人，陽性率為86%<sup>⑩</sup>。1955年8月到1956年4月間，馬海德還率領醫務人員，對哲里木盟扎魯特旗一區進行試點調查治療<sup>⑪</sup>。通過這些措施，中央政府以實際行動體現了其對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重視和支持。

在地方層面，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衛生部在牧區逐步廣泛建立了驅梅站，組織大批醫務人員深入一線開展性病防治工作。在內蒙古東部地區，第一支性病防治隊伍——內蒙古性病防治隊成立於1950年1月，共有57名工作人員。1951年4月，該隊下設的驅梅站由原來的一個發展為三個，人員也從57人增加為188人。從事性病防治工作的區域也由原來的呼納盟擴大到呼倫貝爾盟、察哈爾盟、錫林郭勒盟三個盟。在內蒙古西部地區(當時屬綏遠省)，綏遠省衛生局根據性病防治形勢的發展和中央衛生部的指示，於1952年將綏遠省防疫大隊的三個分隊改組、充實後，組成了有150人的五個驅梅隊，分別派遣到綏遠省的两个盟和兩個行政區開展性病防治工作。1954年初蒙綏合併後，綏遠省性病防治所建制撤銷，併入內蒙古性病防治所。原內蒙古自治區的五個驅梅站，改為1、2、3站，原綏遠省的五個驅梅隊合併成4、5兩站。到1956年，全區性病防治專業人員總數達到530多人，在這些人中，有醫師、中醫師38人；醫士、護士、檢驗士、X線技士等中初級人員380多人<sup>⑫</sup>。

自治區政府衛生部通過在牧區廣泛建立驅梅站，讓牧民得到了直接的治療。更重要的是，性病防治隊不僅是防治隊，而且還是宣傳隊，他們在為牧民治病的同時，還直接當面宣傳中共的民族政策，宣傳自治區「人畜兩旺」的政策。1951年7月至8月，新巴爾虎右旗的性病防疫隊員利用半個月時間深入到各巴嘎給牧民宣傳毛主席的關懷、黨的民族政策<sup>⑬</sup>。在伊克昭盟達拉特旗，性病防治隊員對梅毒治癒的婦女說：「你們不用感謝我們，應該感謝毛主席，這主要是由於毛主席對少數民族的關懷，你將來身體健康了，只要好好勞動來報答毛主席就是了。」<sup>⑭</sup>這種防治和宣傳結合的辦法，不僅促進了性病防治工作的順利

開展，而且也配合了中共的政治宣傳，無疑進一步塑造了中共在牧民中的正面形象。

### 三 性病防治的成效與中共政權的鞏固

從1950年開始至1966年間，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工作，大致經歷試點和普查普治（1950-1955）、覆查覆治（1956-1962）、掃尾（1963-1966）三個防治階段，累計檢查了130多萬人次，治療病人18.7萬多人次<sup>④</sup>。到1966年前後，內蒙古牧區的性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性病的患病率大幅度降低。在整個內蒙古自治區，僅僅在1953至1957年的五年間，經過大規模性病防治，牧區性病發病率從1952年的47%降至1957年12月的14至18%，其中顯發性梅毒從佔患者的約60%降至2%，有的地方甚至降至0.5%<sup>⑤</sup>。到1966年前後，牧區性病被基本消滅。隨着牧區性病的基本被消滅，牧區人口得以迅速增加。就整個蒙古族人口來講，隨着性病等疫病得到基本控制，蒙古族人口逐年增加。與1946年相比，1958年蒙古族人口增加了31萬多人，增加了36%。其他少數民族人口也大量增加：鄂倫春族增加了22%，鄂溫克族增加了39%，達斡爾族增加了66%<sup>⑥</sup>。1954年6月15日，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烏蘭夫也指出：「在『人畜兩旺』的方針指導下，對大部分牧區的性病患者已全部免費治療了一遍，現正在集中力量進行重點根治。性病的危害已大大減輕了，牧區人民健康水平顯著地提高了，呈現出人口增加的興旺氣象。」<sup>⑦</sup>

建國初期自治區政府通過在內蒙古牧區大規模開展性病防治工作，除了取得重大的衛生成效外，還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效：

第一，自治區政府通過性病防治工作，消除了牧民對性病治療的顧慮，從而在廣大牧民與中共之間建立了信任感。在性病防治工作開展前，牧民由於過去曾多次受到過旅蒙醫生的欺騙和敲詐，加之有人造謠破壞，因此他們對治好性病缺乏信心，甚至對免費治病將信將疑，觀望不前。開始檢查工作時，牧民對檢查和化驗抽血十分恐懼，甚至反感<sup>⑧</sup>。在新巴爾虎右旗，1951年7月性病治療開始前，部分群眾對此十分顧慮，尤其在烏蘭察布盟的孢子治療當中，部分群眾擔心治壞<sup>⑨</sup>。在錫林郭勒盟，性病治療前有些牧民懷有「患梅毒是命裏造定的」或「怕注射、抽血、耽誤生產」等思想，因此不願積極就醫<sup>⑩</sup>。在呼納盟，「過去由於反動統治者和流氓醫生的欺騙壓迫，使一部分牧民對於治癒梅毒工作認識不夠，怕抽血，怕打針，怕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所以治療時藏藏躲躲」<sup>⑪</sup>。總之，性病防治工作開始前，廣大牧民心存顧慮，而新生的中共政權通過成功防治肆虐內蒙古牧區多年的性病，切實解除了廣大牧民的痛苦，消除了牧民的顧慮。李本周在1952年總結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工作的經驗時就說<sup>⑫</sup>：

努力解決危害民族健康最大的疾病，因此也就解除了民族人民最切身的痛苦，取得了民族人民的深刻信仰，便利了進一步開展工作。……總之，在自己的切身痛苦被解除之後，他們〔牧民〕就對梅毒治療工作深信不疑了，

對於工作人員就發生了無比的熱愛和崇敬。有的甚至認為毛主席派來的工作人員才是「真活佛」。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人員進一步進行其他衛生工作便很容易了。

隨着廣大牧民顧慮的逐步消除，中共和毛澤東也逐步贏得了廣大牧民的信任和感激，正如《內蒙古日報》發表的一篇通訊所言<sup>④</sup>：

由於在牧業區具體的〔地〕實現了民族政策，解除了牧民的切身痛苦，牧民們都熱愛毛主席，感謝共產黨。許多生了孩子的婦女，抱着娃娃說：「這是毛主席給的」。過去信仰活佛的牧民，如錫林郭勒盟的牧民，現在都這樣說：「活佛在梅毒治療站裏。」因而有病、生小孩多去找醫生、助產士，不再找喇嘛唸經了。

陳巴爾虎旗曾是性病肆虐的重災區，經過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該旗的發病情況大為改善，牧民對中共和毛澤東十分感激。《內蒙古日報》報導了性病被治癒的牧民的感謝之情<sup>⑤</sup>：

毛主席救了我全家，還給了我一個孩子。從前我以為自己的命不好，現在可不相信命了，相信的只是共產黨和毛主席。……千百萬個像××××、散別〔性病被治癒婦女的丈夫，也曾身染性病〕這樣的牧民，衷心感謝毛主席帶給他們的幸福，他們獻出了自己最高貴的禮物——哈達，請北京來的防疫隊帶回去。很多牧民特地在供佛的佛像龕裏，掛上了毛主席的像片。

在巴彥淖爾盟，經過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後，「牧民們每當回憶過去，眼看現在繁榮景象，都無限的感激黨和毛主席」<sup>⑥</sup>。在烏蘭察布盟，北京大學抗梅隊到第七蘇木進行梅毒治療與檢查工作，牧民「聽說這是毛主席特別從北京派來給他們治病的醫生，有病沒病都願意來檢查，很多牧民感動地說：『共產黨的天下，真是大變了，過去花錢也找不到這樣好的醫生啊！』」<sup>⑦</sup>

因此，建國初期自治區政府通過在牧區成功推行性病治療工作，消除了原先存在於部分牧民心中對中共的不信任感，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共的感激之情，從而構建了中共政權與廣大蒙古族民眾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

第二，自治區政府通過性病防治工作，大大密切了中共政權與蒙古族之間的關係，從而也鞏固了新生的中共政權。眾所周知，民眾的支持是政府統治的合法基礎，而政府通過塑造積極的形象，不僅可以改善政府與民眾關係，而且可以鞏固政府合法性。建國初期自治區政府開展的性病防治工作促進了中共與蒙古族民眾之間和諧民族關係的建立。在呼納盟新巴右旗，由北京大學醫學院師生組成的內蒙古防疫隊進行梅毒治療後，牧民說：「過去來到牧區的漢人都是來壓迫剝削咱們的，今天恰恰相反好多人來牧區給我們治病，毛主席和共產黨真好。」臨別時牧民與防疫隊還互相難捨難離<sup>⑧</sup>。隨着蒙漢關係的進一步改善，牧民更加擁護支持新生的中共政權。在伊克昭盟，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結束

後，「不僅解決了人民的疾病痛苦，培養了人民的衛生習慣，而且人民群眾親身體驗到了人民政府對人民的關心，大大密切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與勞動的熱情」<sup>⑤</sup>。一名性病被治癒的牧民婦女就說：「毛主席救了我，慢說毛主席叫咱們給自己打草，就是給公家打，我也要打。以後我一定要更好的勞動，回應政府號召。」<sup>⑥</sup>在烏蘭察布盟，一名性病被治癒的蒙古族婦女也說：「盟旗政府幫助我們消滅人和牲畜的仇敵——梅毒和狼，我們蒙古民族幸福的日子是真正開始了。」<sup>⑦</sup>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報紙對於性病防治成效的報導固然是出於宣傳的需要，但報導的內容本身卻是大體可信的。這也可以從其他資料中得到證實。在錫林郭勒盟，性病治癒的牧民也說：「共產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能重見天日，共產黨是我們牧民的救星。」<sup>⑧</sup>他們認為是黨把一個衰亡的民族挽救了，從貧病中解放出來，實現了「人畜兩旺」<sup>⑨</sup>。學者耿寶雲也認為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根治性病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廣大牧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sup>⑩</sup>。總之，建國初期自治區政府通過在牧區大規模推行性病防治工作，「使牧民進一步的體會到毛主席的關懷，和民族政策的偉大，從而加強了民族間的團結」<sup>⑪</sup>，由此也逐漸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鞏固了新生的中共政權。

## 四 餘論

建國初期，性病作為主要疾病，不僅危害蒙古族民眾的健康，同樣也嚴重危害其他少數民族的健康。在1951年11月23日召開的政務院第112次政務會議上，中央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在報告中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危害最烈的疾病之一就是性病，「性病患者在內蒙、康、藏、青海、新疆地區民族中，約佔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sup>⑫</sup>據著名性病學家胡傳揆等人的研究，建國前少數民族地區梅毒患病者佔調查人數的百分比：四川甘孜州藏族為29.3%，雲南彌勒阿細族為28%，海南島黎族為21.7%，廣西侗族為10%<sup>⑬</sup>。因此，建國初期中共不僅在內蒙古牧區領導了大規模的性病防治工作，也在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開展了性病防治工作。截至1951年底，「中央防疫總隊第七大隊在甘肅、青海的藏、蒙族居住地區，治療了十二萬性病病人。」<sup>⑭</sup>其中在1951年11月，由衛生部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共同組建的中央民族衛生工作大隊赴西康省藏族自治州開展巡迴醫療，到1952年夏天，第一個性病治療區——道孚、乾寧兩縣的驅梅工作已告結束，近千名性病患者擺脫了性病的災難。第二期驅梅工作以爐霍縣為中心，並在康定建立了性病防治所<sup>⑮</sup>。

建國初期中共在蒙、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十分廣泛的性病防治工作，取得基本消滅性病的巨大成效，成為了毛澤東時代的公共衛生奇跡。之所以創造了這項奇跡，主要原因是「黨政重視、發動了群眾、比較認真地做到了最近中央指示的衛生工作必須同群眾運動相結合」<sup>⑯</sup>。具體地講，第一是黨政高度重視，把性病防治工作作為一項推動牧區建設、實現蒙古民族發展的政治工作加以推行；第二是廣泛地進行了群眾宣傳工作，打消了牧民的疑慮，得到了廣大

牧民的配合；第三是廣大醫療衛生人員的艱苦努力和靈活有效的治療措施，使患病牧民得到治療。在具體的防治工作中，廣大醫療衛生人員不僅深入牧區，蹲點開展防治工作，而且尊重牧民的生活習慣，尤其是為了照顧牧民的看管牲畜問題和生活上的困難，事前幫助他們組織了放牧互助組或僱工，並由合作社給予貸款，因此性病治療得到了牧民的配合<sup>⑥</sup>。

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成功，也對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宣傳性病防治工作的成功時，官方也多將之宣傳為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成功。例如李本周談及建國初期性病防治工作的成功原因時，認為「主要是由於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正確貫徹民族政策的結果」<sup>⑦</sup>。《內蒙古日報》記者李治國也說：「伊克昭盟自治區自從解放後實行區域自治以來，隨着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衛生事業得到了很大發展。」<sup>⑧</sup>可見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成功也為當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有力支持。不僅如此，內蒙古自治區是新中國創建最早的自治區，其性病防治工作的成功，無疑對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疾病防控工作的推行提供了經驗，從而推動了全國其他民族地區衛生事業的發展。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楊靜仁在1951年總結民族工作的成就時就說：內蒙古自治區在包括衛生在內的各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說明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內蒙人民是怎樣走上發展的道路。而這同時也對中國其他少數民族提供了向前發展的榜樣」<sup>⑨</sup>。

總之，建國初期自治區政府通過在內蒙古牧區推行性病防治工作，不僅取得了巨大的醫學和公共衛生成就，而且踐行了中共的民族政策，塑造了中共在蒙古族民眾中的正面形象，從而有助於新生政權的鞏固。

### 註釋

① 在十六世紀前，中國無梅毒的記載。據學者考證，中國最初在1505年發現梅毒，傳入原因是有葡萄牙商人到中國經商，途徑印度感染所致。在1506至1512年間，廣東省曾有梅毒流行，故梅毒最初又稱「廣東瘡」或「楊毒瘡」（參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380）。根據這一記載，內蒙古地區梅毒流行至少是從明代中後期才開始的。也有人認為內蒙古地區的性病是從清代中葉（十八世紀後期）由外地傳入，到清末民初達到極點（參見《內蒙古衛生事業四十年》編輯委員會編：《內蒙古衛生事業四十年》，上冊[呼和浩特：內部資料，1987]，頁98）。

② 關於建國初期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工作的研究，主要論著有《內蒙古衛生事業四十年》，上冊，頁98-125；錢信忠：〈中國消滅性病之回顧〉，《今日中國》（中文版），1985年第8期，頁11-13；吳秉仁：〈從內蒙古牧區性病防治效果看新中國性病防治成就——內蒙古自治區性病防治後梅毒現患和血清學追訪調查〉，《中華流行病學雜誌》，1999年第3期，頁138-40；耿寶雲：〈「人畜兩旺」是怎樣實現的——新中國前期內蒙古牧區和諧發展的啟示〉，《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32-37；王劍利：〈內蒙地方公共衛生進程的人類學闡釋〉（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等。尤其是王劍利的碩士論文對內蒙牧區「消滅性病」和「婦女保健」兩個公共衛生進程及生殖健康認知進行了歷史與人類學研究。

③ 呼倫貝爾盟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呼倫貝爾盟志》，下冊（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頁2229。

④⑤ 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20。

- ⑥ 蒙藏委員會：〈額濟納旗舊土爾扈特旗報告書〉(1936年5月)，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439-1-76，頁142。
- ⑦ 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內部資料，1939)，頁74。
- ⑧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衛生局編：《赤峰市衛生事業四十年》(赤峰：赤峰市衛生局，1987)，頁103。
- ⑨ 畢志剛主編：《皮膚性病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頁427。
- ⑩⑪ 參見譚剛：〈近代內蒙古地區疾病流行與蒙古族社會變遷〉，《中華醫史雜誌》，2013年第2期，頁99；100。
- ⑫ 《錫林郭勒盟志》編纂委員會編：《錫林郭勒盟志》，下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頁1472。
- ⑬ 關於近代以來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情況，學術界認識存有分歧。有的學者認為近代以來蒙古族人口增長十分緩慢。曹樹基認為，清初以來的三百年間，內蒙古蒙古族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7%。(參見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450)。另據內蒙古大學張植華的研究，清初至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增加了20.3%(張植華：〈清代至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概況〉，《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4期合刊，頁55)。另外也有許多學者認為近代以來內蒙古蒙古族人口是絕對減少。據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官員賀揚靈在1933年調查察哈爾、綏遠地區的蒙古族後估計，僅在綏遠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土默特旗的蒙古族人口就由清初的290,500人減至1933年的197,319人，人口減少了93,181人，人口減少百分率為32%(參見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頁15，表20)。另據對蒙藏事務頗有研究的黃奮生調查研究，整個蒙古族人口從清初的1,104,750人減少至1935年前後的908,414人，人口減少了196,336人，人口減少百分率為17.8%(參見黃奮生編：《蒙藏新志》[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24-25，表28)。據沈斌華研究，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從十九世紀初的100餘萬降至1912年的87.8萬，減少15%左右(沈斌華：〈近代內蒙古的人口及人口問題〉，《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頁9)。造成近代以來內蒙古人口減少的原因有很多，但以性病為主的疾病流行是其中重要原因。
- ⑭⑮ 《內蒙古衛生事業四十年》，上冊，頁100；99-100；109。
- ⑯ 烏蘭夫：〈在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載《烏蘭夫文選》，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58。
- ⑰ 烏蘭夫：〈蒙古民族的發展特點與解放道路〉，載《烏蘭夫文選》，上冊，頁104。
- ⑱ 烏蘭夫：〈錫察兩盟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畜牧業〉，載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論牧區工作》(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頁19。
- ⑲⑳㉑ 李本周：〈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工作的經驗〉，《內蒙古日報》，1952年12月6日，第1版。
- ㉒ 〈治療梅毒是重要的政治任務〉，《內蒙古日報》社論，1951年4月25日，第3版。
- ㉓ 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內蒙古大事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頁470。
- ㉔ 〈鞏固已得成績，為進一步開展梅毒治療工作而努力〉，《內蒙古日報》社論，1952年12月6日，第1版。
- ㉕㉖㉗㉘ 李治國：〈四年來伊盟衛生事業有很大發展〉，《內蒙古日報》，1954年1月6日，第3版。
- ㉙ 〈「內蒙古衛生」秋季報導中心〉，《內蒙古日報》，1951年8月3日，第3版。
- ㉚ 〈烏蘭察布盟自治區的成就：兩年來的衛生成就〉，《內蒙古日報》，1952年12月24日，第3版。
- ㉛ 胡志宵：〈「人旺」在草地開始實現了！〉，《內蒙古日報》，1951年11月28日，第1版。
- ㉜ 明太聯合旗六佐婦女：〈感謝毛主席派下的驅梅醫療隊救了我的命〉，《內蒙古日報》，1952年5月9日，第2版。
- ㉝ 王煒：〈談談「那達慕」大會〉，《內蒙古日報》，1953年9月30日，第3版。

- ②⑨ 〈在呼納盟「那達慕」大會上的衛生宣教工作〉，《內蒙古日報》，1951年10月21日，第3版。
- ③⑩ 莫德勒圖：〈治療梅毒宣傳工作的幾點經驗〉，《內蒙古日報》，1951年12月19日，第4版。
- ③⑪ 〈楊植霖副主席在綏遠省一屆三次人代會上關於綏遠省人民政府四年來的工作報告摘要〉，《內蒙古日報》，1954年2月28日，第3版。
- ③⑫ 胡傳揆：〈梅毒的傳播及其在中國的消滅〉，載《中國科技史料》編委會編：《中國科技史料》，第二輯（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0），頁108。
- ③⑬⑭⑮⑯⑰ 白仁昌：〈內蒙防疫工作隊在新巴右旗治療梅毒的情況〉，《內蒙古日報》，1951年10月9日，第3版。
- ③⑱ 《巴彥淖爾盟志》編纂委員會編：《巴彥淖爾盟志》，下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頁1447。
- ③⑲ 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哲里木盟志》，下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頁1646。
- ③⑳⑳ 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局編：《內蒙古自治區志·衛生志》（呼和浩特：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頁155；160。
- ③㉑ 陳天風：〈蒙民的感激——記伊盟達拉特旗的梅毒治療工作〉，《內蒙古日報》，1953年5月21日，第3版。
- ③㉒ 林國遠：〈信心百倍迎新年：內蒙古衛生事業在邁進〉，《內蒙古日報》，1958年1月1日，第3版。
- ③㉓ 胡昭衡：〈十二年來文教衛生事業的偉大成就〉，《內蒙古日報》，1959年10月12日，第3版。
- ③㉔ 烏蘭夫：〈蒙綏合併與內蒙古自治區建設〉，載《烏蘭夫文選》，上冊，頁336。
- ③㉕ 錫盟記者組：〈錫盟梅毒治療取得初步成績〉，《內蒙古日報》，1952年8月17日，第1版。
- ③㉖ 張林：〈介紹呼納盟治療梅毒工作中的幾點經驗〉，《內蒙古日報》，1952年5月16日，第3版。
- ③㉗③⑸ 〈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內蒙牧區梅毒普治一篇〉，《內蒙古日報》，1952年12月6日，第1版。
- ③㉙ 本報記者：〈內蒙古人民在勝利前進——民族衰弱的狀態是一去不復返了〉，《內蒙古日報》，1953年5月14日，第3版。
- ③㉚ 雅春：〈保障了人民健康，普遍建立起醫療衛生網，促進了生產發展：巴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迅速〉，《內蒙古日報》，1964年3月10日，第3版。
- ③㉛③⑹ 艾丁：〈蒙古人民幸福的日子開始了〉，《內蒙古日報》，1950年9月16日，第2版。
- ③㉜ 厚和：〈難忘的錫林郭勒盟牧區工作〉，載內蒙古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五十九輯（內部資料，2006），頁126。
- ③㉝ 寶力根扎布：〈「三不兩利」政策實現了「人畜兩旺」〉，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五十九輯，頁155。
- ③㉞ 耿寶雲：〈「人畜兩旺」是怎樣實現的〉，頁33。
- ③㉟ 〈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關於全國少數民族衛生會議的報告〉，《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2日，第3版。
- ④⑰ 胡傳揆等：〈我國對梅毒的控制和消滅〉，《科學通報》，1965年第6期，頁504。
- ④⑱ 〈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全國防疫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2年1月4日，第3版。
- ④⑲ 王甸：《兩年來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北京：民族出版社，1954），頁15。
- ④⑳ 〈發動群眾，完成今年衛生工作的新任務〉，《內蒙古日報》社論，1953年1月23日。
- ④㉑ 楊靜仁：〈一年來的民族工作〉，《人民日報》，1951年3月4日，第3版。